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学科观念与 文学史建构

陈国恩◎著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陈国恩◎著



学科观念与 文学史建构

【璇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科观念与文学史建构 / 陈国恩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61 - 1243 - 4

I. ①学…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
史—研究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138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秦 艳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主 任：赵世举 刘礼堂

副主任：尚永亮 陈国恩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献初 王兆鹏 吴天明 张 洁

张荣翼 陈文新 於可训 涂险峰

目 录

第一辑 学科观念与文学史编写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问题的对话	(3)
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	(29)
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35)
“汉语新文学”的功能优势及研究方法	(42)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50)
学科调整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问题	(66)
再谈现代旧体诗词慎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	(77)

第二辑 华文文学学科及研究模式

3W:华文文学的学科基础问题	(91)
海外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100)

从“传播”到“交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模式的选择	(108)
香港电影的后现代性流变	(122)
澳门新移民文学的语境及发展前景	(131)

第三辑 批评观念与批评家角色

文学批评的状态和批评家的角色	(147)
纯文学究竟是什么?	(162)
寻根文学的寻根之失	(172)
新保守主义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185)
40年代左翼期刊译介俄苏文学文论的流派特色	(199)
挣扎在欲望与救赎之间——论西方人性观的演变	(214)

第四辑 文学经典与中国形象

鲁迅的经典意义与中国形象问题	(229)
伦理革命的困境和传统文化的绵延:从《伤逝》 到《寒夜》	(236)
经典阐释与当前中学鲁迅作品教学	(251)
京派文学的时代性与超越性	(264)
闻一多的信仰者心理	(276)
论《原野》戏剧音响的多重功能	(288)

知青作家的草原小说与内蒙古地域文化	(299)
-------------------------	-------

第五辑 珞珈学苑之风景线

陆耀东教授的学术道路和治学风格	(317)
易竹贤先生的鲁迅研究与胡适研究	(334)
龙泉明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340)
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研讨课的设计及实践	(348)
近年来武汉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	(361)
武汉大学鲁迅教学和研究的世纪回顾	(375)
后记	(393)

第一辑

学科观念与文学史编写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 问题的对话^{*}

中国现代文学已走过百年路程，但作为一个学科，它还年轻。这主要是指它的架构和基本规范还不能说已经定型。起点问题在新世纪一再被热议，说明这一学科还面临着新的发展问题。对起点问题的看法涉及对学科性质、学科评价标准、学科功能和发展前景的理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为了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问题的讨论，武汉大学、苏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的几位学者进行了一次对话。他们的对话有一致也有分歧，而分歧恰好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到了学术界前面。现在把这篇对话整理出来，希望能引起大家对起点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陈国恩：今晚我们顺着白天大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

^{*} 本文是陈国恩、范伯群、周晓明、汤哲声、何锡章、谭桂林、刘川鄂、徐德明对话的整理稿。

十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讨论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继续交换一些意见。学科内涵与外延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学科现在面临着新的情势,比如国学热兴起,也包括范伯群先生领头的通俗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结构的新思考。这个变化的影响将是深远的,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不能不予以重视。我们有幸请到了范先生,先请范先生发言。

范伯群:我上午在大会上的发言是我这次想带到会上向大家请教的两个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很重要,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因此,今天晚上也请你们几位一起来“会诊”。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的“起点”是否应该“向前位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不应该是一部单纯的知识精英话语的文学史,而应该是一部“多元共生”的文学史。

其实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自从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20世纪文学”的新概念以来,已经有多部“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出现,实际上很多同行已经同意了现代文学史应该以1898年为“起点”。而我认为也要像新文学对《狂人日记》的评价一样,《狂人日记》是一个新文学起点的标志性的丰碑;那么现代通俗文学也应该有它的划时代杰作,我认为应该是《海上花列传》。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上,题目是:《〈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都转载了,高教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文学研究前沿》上也全文翻译了。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我将这部小说视为“古今演变”的一个交接点的鲜明标志。在知识精英文学的丰碑还要迟1/4世纪才诞生,而它作为通俗小说的优秀代表作却已悄悄地开拓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领域。我认为这部小说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

术技巧乃至发行渠道，都显示了它的原创性的革新的才能，也说明了中国文学即使没有外国文学思潮的助力，也会缓缓地走上现代化之路，我们民族文学自身就有这种内在的要求与动力。

有人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是否定“五四”，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何来‘五四’”是承认并重视“五四”，只是说明“五四”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晚清有些先行者曾“孤军奋战”，有的集团也曾“小股突击”，他们曾像萤火虫那样在发光；但是只有到了“五四”，我们才有能力展开阵地战，形成巨大的冲击波。但是我们应该记取在这之前，例如有梁启超的“文界革命”等的铺垫。“百川汇海”这才有了“五四”！可是还有一个“星火燎原”啊！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从何时讲起，就成了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多元共生”的问题。我们将现代文学史分成三个10年，或者从1917年算起到1949年为止。而我认为现代通俗文学有将近60年的历史。我在《文艺争鸣》2007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三段论”，我用12个字试图概括这三段，即《开拓启蒙·改良生存·中兴融会》，人大复印资料与《新华文摘》都转载了，大家很容易找到。我认为通俗文学有“开拓启蒙”之功；而当受到新文学界的批判时，它“改良”自己，以求得“生存”；发展到张恨水等作家使它“中兴”之后，接着是张爱玲、徐訏、无名氏等作家进行了一道“超越雅俗，融会中西”的工序。但是多元共生绝不单单是雅俗共生的问题，一部多元共生的文学史里还会有新文学内部多个流派之争与对他们各个的评价，有少数民族文学，有世界华文文学，也会有国民党文学，还有古体文学（如现代时段所写的古体诗词），等等。但是文学史不等于政治协商会议，不一定要有各方面的代表，而是要经过以文学为本位的质的鉴定，才能进入

文学史。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从“配合政治”过渡到以“文学为本位”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我们这个学科正处在一个新的大有可为的阶段。但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应该在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与审美辨析的双重权衡中慎重推进，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打磨与淘洗，这就需要我们全体同行群策群力去努力完成的历史性工程。我思考的“向前位移”与“多元共生”这两点，不知各位有何见教。

陈国恩：范先生很严谨，我理解您是想把现代文学的上限往前面推，但先明确肯定这是在通俗文学的范围内说的。通俗文学的起点能不能作为新文学的起点？这涉及了现代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关系。说通俗文学是新文学的起点与说通俗文学是新文学的源头，这是两回事情。如果说是新文学的源头，对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制不会构成根本性的颠覆。但假如说它是现代文学的起点的话，那情况就不同了。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他的意思是晚清文学中的欲望、知识、价值等，已经具有现代性，这对于提醒人们注意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联系是很有意义的。但问题在于，按照这种对现代性的理解，我们也可以从晚明文学中找到相似的东西。晚清小说的欲望化叙事也很突出，晚明的出版业也已经相当发达，晚明的商品经济也已比较繁荣，史学界一直有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于晚明。按这样的逻辑，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进一步推向晚明，甚至进一步推到更早的话本小说和唐传奇，话本小说中的欲望叙事其实并不比晚清小说逊色。这种联系，是文化传统的一脉相承，说明要在文化传统的两个阶段之间寻找前后的联系并不困难。从更早的诗歌和小说当中找到一些与晚明文学相近的因素都很容易，像《孔雀东南飞》、《诗经》里面对爱情的描写等，都是人同此心，可是我们显然不能说中国现代文学从那时已经开始

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现代文学，包括今天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晚清的学者，都是在学科的范围内提出问题，都没有解构这个学科的意图。可是我们所运用的逻辑，却存在着使这个学科的独立性解构的可能。现在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把晚清文学、晚明文学，甚至更早的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那没有问题，把《诗经》跟现当代文学联系起来都可以，它体现的只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问题。二是把晚清文学或晚明文学当作现代文学的起点，这就关系到这个学科独立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仅从它跟古代文学——实际上是两个学科——的联系方面来看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现代文学的起点就不可能停止在晚清，肯定还可上溯到晚明，甚至更早，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学科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样的现代文学，按我理解，实际上就不是现代文学学会所面对的现代文学，它可能变成某个朝代的文学，比如民国文学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具体命名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肯定不是与古代文学相对称的现代性的那样一种现代文学了。我所担忧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周晓明：我觉得思考现代文学学科问题要有“学科学”的观念。换言之，当我们讨论现代文学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对象、起点的时候，首先要有学科学的观念。所谓“学科”，其最基本的含义是以学术分类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分支；所谓“学科学”，则是对这种学术分类的理据、规范，研究分支发生演化及其规律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根据我的理解，无论是学术分类还是学科发生，大多遵循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围绕研究对象取舍与展开。我打个比方，数学主要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物理主要研究物质、能量、时空及相互关系；化学在分子和原子的水平上研究物质的性质、结构、变化等；传播学的学科渊源、方法则更为庞杂，唯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人类交

流传播现象，让它凝聚为一个学科。总之，一个学科，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其分类的依据主要是研究对象而非研究观念或方法。这是学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按照这个思路追问，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对象，不能仅由单一角度或维度来决定，而应当至少考虑以下几点。第一，我觉得要考虑民族国家，尤其是国家政体问题。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我主张的“现代中国文学”，首先都是“中国”的文学，而不是“美国”的或其他什么国家的文学。因此，民族国家的不同首先决定了我们研究对象的不同。第二，有一个国家政体变化，尤其是朝代更迭的问题。事实上，文学观念、方法和内容的变化，虽然是一般文学研究、文学形态学考量的重点之一，但绝不是文学史分期的依据。从先秦到晚清，都存在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脉络；但你不能从它的文化、文学精神上去划分中国古典文学分期，而只能从朝代更替上去进行文学史的断代。要言之，首先要有民族国家、朝代更迭文学的概念，然后才有古典文学形态和现代文学形态的概念。从晚清到民国，文学的演化，事实上包含了上述两种维度的变化。我们考虑现代文学的对象的时候，这两个维度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我同意陈国恩的观点，不能无限追溯。

除了国家、国体这些尺度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大框架的问题。我自己的体会是，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最大区别就是它整个意识形态的框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就看到鸦片战争以前的主流话语、基本术语——无论哲学的、思想的、政治和文化的——与晚清、“五四”的话语、术语乃至表述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晚清之前说的那一套，大多数是儒家的；等到后来，尤其是五四时期，就少见这些话语、术语——它们已经退到

很次要、边缘化的位置。这都说明了意识形态框架、基本思想预设和核心价值观念都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是国家、国体以外衡量文学质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学性质/形态方面的自觉性的问题。在前代的文学里面，比如在唐宋元明的文学变迁中，都没有太明确地自觉“我就是一个不同质的文学”；而更多只是自认为是一个朝代更替中的文学、风格变化中的文学。但是唯独在现代文学或者新文学里面，它是意识到或者想力图做到我是和过去不一样的文学。这里存在一个文学主体、文学“集体有意识”诸层面的自我切割和认同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现代文学的“集体有意识”的形成，我认为应该还是民国以后，这是一个大的发展。结合国家国体、政体和意识形态框架的变化来看，从晚清到五四，这是一个大转折：中国文学的古典时代，事实上随着清帝国的衰亡而走向终结；晚清所关注的文学改良问题，到五四就彻底地变成了新和旧的问题。因此，文学的自觉意识，学科的分类依据，首先当从纵向来划分。横向的我很同意范老师的意见。文学对象的一个纵横的切割从开始到哪儿，结束到哪儿，应该包含这些东西。我们这个新文学的概念，长期是从性质上划分的。包括今天黄修己先生讲的立言、合法性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尽量超脱一点，不应该是一加一，或加法减法问题。作为史家的话，只要是“现代中国”这个时空中的文学，都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或者是现代中国文学。这里面，既有通俗的文学，也有不通俗的文学；既有文言的文学，又有非文言的文学；既有文明新戏，国民党的文学，又有共产党的文学；还有台湾的。总之，它应该是多元的和开放的。对现代中国文学对象的把握，还当包括汉语文学和非汉语的文学。这才是我们所谓真正的现代的中国文学的一个完整的面貌。史家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

虑文学。总之，在思考我们的学科对象时，我觉得把纵的和横的结合起来去考虑比较实际。

汤哲声：我想谈谈我的观点。我始终认为认定现代文学的发生期首先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就是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是什么。你如果不把这个性质搞清楚，你就很难说是什么时间发生。我觉得现代文学的发生期要根据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来确定。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什么我们听到很多的观点，包括大家今天讲的，包括今天下午大家发表的那些观点。但我总觉得缺了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单纯地讲某一种观念变革，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应该从三个层面上去思考：一个是文学观念；一个是创作观念，还有一个是生产基础。一个多层面的观念的变革，才能形成现代文学的发生期。那么从这三个层面的角度来看，现代文学的发生出现了什么变化呢？从文学观念上来讲，是提出了“人的文学”。这个不错，应该肯定。人的文学的提出显然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变革，这是我们的人文精神。那么创作观念是什么？我觉得现代文学的创作观念有很多。主流的文学观念还是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工具，它的社会性很强。现代文学不像古代文学那样将创作看做聊以自慰或者给皇上的颂歌，现代文学要求文学创作进行社会改造和民众启蒙，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第三个层面就是生产基础。其中生产基础很重要。我觉得现代文学的生产基础和大众媒体有很大关系。因为古代文学是没有什么大众媒体的，它完全靠自己或者亲朋好友出资印刷。这三个层面必须结合到一起才能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因为这是我们现代文学独有的东西。那么，根据这三个层面的变革现代文学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我认为，应该往前推。范先生的意见，包括我的意见，那就是《海上花列传》。范先生讲得比较客气，说它是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但我认为现代文学就是从《海上花列传》开始的。为什么？